

民间魔术家的人生传奇

本报记者 余英茂



韩保金老人为记者表演魔术

核心提示

焦作市区有一位远近闻名的民间魔术家，他不但擅长表演口吐火焰、三分活人等魔术绝活，将自己的家庭培养成了魔术世家，还带出了数百名魔术人才，他就是年过六旬的焦作市魔术家协会会长韩保金。

3月22日下午，记者慕名来到焦作市山阳区思村一街189号韩保金老人的家中。采访中，韩保金和他的儿子及孙子表演了精彩的魔术，记者不禁暗中惊叹——这真是一个祖孙三代均有绝活的魔术世家。而随着韩保金老人对他40年魔术生涯的慢条斯理的讲述，一幕幕传奇经历，更是令记者拍案惊奇……

魔术使他“走火入魔”

韩保金是土生土长的焦作人。1958年，10岁的韩保金随同支援煤矿建设的父母迁居平顶山矿区。平顶山市的宝丰县是闻名全国的

“杂技窝”，宝丰的杂技团经常到平顶山矿区演出，艺人们表演的出神入化的魔术，犹如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韩保金的心。

从此，只要听说当地有魔术演出，韩保金就要想方设法前去观看，看完后回到家里就用心琢磨魔术的奥秘。时间长了，一些魔术竟然被这个少年破解出了门道，他时就常把琢磨会的魔术表演给同伴或大人看，小小年纪，表演的一招一式还真像那么回事，吸引了很多人观看，这让韩保金钻研魔术的劲头更大了。

初中毕业后，韩保金被招收到平顶山矿务局上班，先后当过采煤工、辅助工。成年后的韩保金仍然痴心不改，在魔术的迷宫里越走越深，每月的工资发到后，他不是像别人那样去买烟抽酒喝，而是买来魔术书籍钻研。采访中，韩保金拿出《中国魔术》、《中国魔术变法》等书籍对记者说：“这样的魔术书籍我买了整整一大箱子！”就这样，韩保金掌握的魔术诀窍越来越多。

魔术让他赢得了爱情

爱好魔术不仅使韩保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还使他赢得了一位局长千金的爱。

1970年的一天，22岁的韩保金来到平顶山商业局演出，他用娴熟的动作一会儿表演“白纸变钞票”，一会儿又是“礼帽炒鸡蛋”，台下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不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韩保金英俊洒脱的舞台形象，深深地留在了观众席上的一位姑娘心中。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中，魔术师韩保金的影子在姑娘心中再也挥之不去。几天后，姑娘硬是缠着姐姐陪同她来到平顶山矿务局宣传队打听韩保金的情况。

后来韩保金才知道，这位姑娘名叫李淼，是平顶山市一位局长的千金。魔术，犹如一条纽带，在两人之间点燃了爱情的火花。最终，李淼和韩保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说到这里，韩保金的老伴李淼告诉记者：“他年轻时用神奇的魔术把俺给忽悠住了，俺就嫁给了他。”

魔术帮他讨回百万债务

1985年，韩保金随退休后回乡定居的父亲迁回焦作，被调到焦作市化工三厂，当了一名开泵工。

得知韩保金具有表演魔术的特长，知人善

任的厂领导不但经常让韩保金为本厂和其他单位的群众表演魔术，还把他调入销售科，希望他能够攻克厂里存在多年的“要账难”的问题。

1990年秋季的一天，韩保金和同事来到南京一家玻璃厂催要20万元的欠款，话刚说出口，他们就碰了个“软钉子”，财务人员都称没有钱。见场面要“冷”下来，韩保金给同事使了个眼色，同事指着他说：“今天先不说还账的事，这位是河南来的魔术师，让他给大家表演几招，加强咱们之间的友谊。”

财务人员仍然面无表情地看着韩保金，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伸手在空中挥舞了一番，眨眼间，韩保金刚才还空空无物的手里竟然变出了一支香烟。就这样，在场的男士都得到了韩保金变出的一支香烟。走到会计和出纳两位女士面前时，韩保金的手指一弹，一块精美的糖块落到她们面前，一会儿，他竟然变出了一堆糖块！

韩保金的表演使人看得目瞪口呆，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突然间，韩保金指着女出纳说：“你戴着金手链！”女出纳捋开袖子，果然露出了一条金手链。韩保金接着说：“你还戴着金脚链！”在人们“不可能”的疑问声中，女出纳挽起了裤脚，果然露出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金脚链，众人不禁发出一片惊叹！

这时，财务处长有些不服气地问：“你能看出我的上衣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吗？”韩保金回答：“你兜里有30多元钱！”财务处长翻开兜一数，果然是30多元钱，众人大为吃惊。停了一会儿，韩保金严肃地说：“我不仅能看出你兜里有钱，还能看出你们的保险柜里也有钱。”财务处长摆了摆手说：“今天算是碰到高人，我服了！”

韩保金用魔术开路，迅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这家企业的财务人员深深地折服了，他们不但变请了韩保金和他的同事，还当即答应分批还清他们讨要的债务。附加条件只有一个——请韩保金经常去南京做客，为他们表演魔术。

几年来，韩保金走到哪里，就把魔术玩到哪里，将欢声笑语带到哪里。他用魔术广交朋友，不但将企业积压多年的库存产品推销了出去，而且为企业讨回了100多万元陈年旧账，

多次受到厂里的表彰。

魔术给他带来幸福生活

采访中，韩保金祖孙三代都为记者表演了精彩的魔术。

表演“扇子生钱”节目时，韩保金拿出一把折扇，记者验看这是一把普通的纸扇。韩保金将纸扇打开又合拢，一会儿，纸扇柄上竟然慢慢地冒出了多枚一元硬币，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韩保金表演了“白纸变钱”。几张白纸在他手里晃了几下后，竟变成了百元钞票。随后，韩保金的儿子韩军平则让记者随意抽一张扑克牌放在桌面上，一会儿再揭开，竟然变成别的牌了。韩军平又端来一桶水倒入空鱼缸，然后将一块绒布盖在鱼缸上，几秒钟后揭开绒布，鱼缸里竟然多了几条金鱼……精彩的表演让记者连连称奇。

记者了解到，韩军平不仅要耍魔术，而且还会数来宝。韩军平12岁的儿子韩旭东也是要得一手好魔术，还会武术，这个魔术世家可谓多才多艺。

多年来，韩保金不但努力钻研魔术，还办过多期魔术学习班，他的正式弟子有38人，教过的学生达几百人，其中有多名高弟子由于表演出色被部队招收当了文艺兵，还有一些下岗工人、残疾人因此找到了工作。

韩保金是个街坊邻居夸赞的孝子，当年他曾经把不愿就医的母亲“骗”进医院，跪在地上求医生全力救治，使在“鬼门关”前徘徊的母亲又多活了几年。韩保金要求徒弟也必须孝顺父母、人品好，他特别乐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焦作市高新区张建屯村青年崔富新患有小儿麻痹，因腿脚残疾找不到工作，韩保金考察发现此人人品不错，就收他为徒。有了魔术技术在身，崔富新自然不愁没有饭吃。

如今，韩保金老人对魔术表演的痴迷程度仍不减当年，他们祖孙三代经常一同登场，为观众表演魔术，徒弟们也时常来看望老师，韩保金的家里常常充满欢乐的笑声。

两法官超期羁押无罪释放

他们为何迟迟得不到国家赔偿

农民含冤自杀，两法官遭逼供

2002年4月7日，一名叫叶财兴的农民怀揣遗书服毒自尽于余干县城大街。遗书上写着“冤枉”二字，内容写道：

“我是(集贤)大世界余细火的丈夫。受害者余细火被朱再根打伤，伤情严重，经公安分局处理，朱再根赔偿了余细火医药费900元。赔偿之后，朱再根利用余干县人民法院付(副院长朱新明(明)……)起诉受害者余细火……在民事庭四处打招呼。结果朱再根就买动(通)朱加荣、彭云(仁)献、高国才作假证……之后有(又)在刑事庭起诉受害者余细火……余干县法医室开始鉴定是轻微伤甲级，后来又变成了轻伤乙级……”

遗书感叹：“如有苍天在上，望政府执法机关查明作假证真相(相)，假证确实害人害死人的。老百姓喊天不应，喊地不应，只有死路一条……”

舆情震惊，余干县纪委与县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2002年4月18日晚，与此案有关的县法院法医室主任、刑事庭副庭长缪建平和民事庭法官江柯被县纪委“双规”。10天后，副院长朱新明亦被“双规”。

其后，缪建平两次被取保候审，又两次被羁押。江柯和朱新明亦先后被逮捕。司法调查期间，市、县主要领导在多次大会上提起该案，定性为“司法腐败案”。

2003年2月3日，上饶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据查，叶财兴和盛正科都是余干县农民，他们在县城集贤大世界各开了间小饭店，两家相邻。2001年4月29日，两家为琐事发生冲突，盛正科之子和叶财兴之妻余细火受伤。在县城公安分局协调下，盛家被要求赔偿叶家900元。

盛正科认为不公，找到与妻子朱再根同村的县法院副院长朱新明。结果，在没有伤情鉴定的情况下，县法院告中庭受理了盛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将案件移交刑事庭，但被刑事庭退回。随后，朱新明问缪建平，他亲戚的儿子被打昏了，能否鉴定为轻伤乙级。但缪建平只作出了轻微伤甲级的法医鉴定。告中庭将此案转给民事庭。

民事庭调查期间，盛正科多次找到朱新明、承办法官江柯和缪建平，说医生讲有脑震荡，能否把鉴定(重新)做过。缪答复“脑震荡认定要从严把握，要有在场证人证实被打昏”。8月10日，不在冲突现场的彭仁献、高国才二人，在盛正科授意下，向江柯证明“盛小乐被打倒在地，口吐血沫，昏迷不醒”。此后，证人朱家荣再次来到民庭，改变了第一次证词，作出与彭、高类似的陈述。

8月29日，缪建平复检查得出盛正科儿子轻伤乙级的结论。盛正科据此再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庭审理期间，叶财兴表示愿意赔偿对方3000元，盛也表示同意，后因余细火不同意未果。

庭审中，因余细火对法医鉴定持有异议，

刑事庭承办法官于2002年4月1日带诉讼双方到上饶市中院对盛正科儿子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期间，叶财兴接到代理律师的电话，说鉴定可能维持原来的结论。4月7日，叶服毒自杀。

上饶县检察院指控朱新明“到处打招呼，施压力，要江柯取假证，要盛正科找证人改变证词，要缪建平认定轻伤”，涉嫌徇私枉法罪；指控江柯“在缪建平处得知认定脑震荡必须要有证人证实盛正科儿子被打后当场昏迷的条件下，有意地指示盛正科找人作伪证”，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指控缪建平“提示朱新明、江柯认定轻伤条件，复检时，不审查证据的真伪，不问问伤者近事遗忘的必备条件，便认定脑震荡”，涉嫌玩忽职守罪。

检方认为，三被告人在主观上均具有徇私枉法的故意，虽无明显的语言共谋，但各自清楚自己的目的和行为，并且在行为中通过互相打招呼，各自实施自己的行为，形成共谋，属于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神会、互相配合的共同犯罪。

对此，江柯辩称，他叫盛正科提供证人证实其诉状中的情节，是履行法官的阐明权，但自己并无指使盛叫人作伪证。朱新明只是叫他尽快办案。

缪建平称，给盛正科儿子伤情复检时，不可能知道江柯提供的证据系伪证，脑震荡法医鉴定中所谓“伤者近事遗忘的必备条件”并非必不可少，无论是法医学教材，还是法医实践中(包括缪以前做过的鉴定)，均有此实例。

法庭上，两名法官翻供，称遭受刑讯逼供。县检察院拘传的最初34个小时里，缪建平被违法连续传唤，其违法证据被法庭认可。

而江柯无法忍受“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痛苦，在“双规”第六天自杀。“我坐在床上，用被子挡着，把眼镜架的两支十多厘米长的铁柄拗断，再逐一打桩似的慢慢刺入左胸，自杀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资料图片

再审亦无罪，赔偿杳无音

2004年5月，在无罪释放4个月后，江柯、缪建平向余干县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另外，江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支付身体、精神损害赔偿及律师费45万元，缪要求支付16万元。

此前，两名法官已持续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追究主办检察官的责任，包括违法连续拘传、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

他们没有等到任何答复。相反，这年11月，江西省检察院对此案抗诉，案件进入再审阶段。

2005年5月13日，省高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判决书里，对叶财兴自杀的原因作了进一步厘清，“是盛正科指使他人作伪证。”

8月31日，两名法官终于在县检察院得到回复，“检察长说最迟9月底10月初之前，一定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但9月30日，“他们又说，省检察院说还要再抗诉。”

事实上，检察机关至今并无抗诉。9月，县纪委一名副书记找到缪建平了解情况，缪打听到，市主要领导在他的举报信上已经批示，县纪委正在调查，但后来再无实质进展。

事，几次都要我出示证件登记，来到我们法院也请你出示证件。”双方发生口角，被告人劝开。

当晚8时左右，缪建平在外接待外地法院来人，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来到缪家，高声呼喊要缪出来，并打砸铁门。缪建平猜想与白天事情有关，打电话给法院院长，院长表示会与检察院检察长处理好此事。

不明身份者离去后，缪建平回到家中。法院两名副院长和检察院纪检组长也来到缪家进行安抚，表示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但第二天早上7时不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再次围堵缪家门前，刘新娥哥哥就在其中。据缪建平说，这伙人头戴头盔，手持铁棍，刘新娥哥哥高喊：“刘新娥弄得你坐牢没坐够，今朝我捂(打)死你！”他们把铁门砸开，但被邻居劝阻和及时赶到的110巡警制止。缪建平岳母在惊惶中把左腿扭伤。

刘新娥对第二次围堵予以承认：“家里人去了，弄坏了锁。”她将此归咎于缪建平的责任：“他在法院大厅里当众侮辱我，在楼梯间还打了我，只是没有旁人看到。”

刘新娥说，当初即使办的是错案，也不是个人错，是单位错。

在余干等地，一伙人上门武力相对叫做“闭门”，民间认为是这户人家的奇耻大辱。对于此次事件，余干县委先是拿出一个协调意见，要求缪赔礼道歉，刘再赔偿他50元门锁损失费。刘新娥表示满意：“领导从大局着想，还是公正的。”

但缪建平认为颠倒黑白，拒绝道歉，适逢县里召开两会，他找到代表、委员住地反映情况，并最终找到县委书记，“他说我要求刘新娥出示证件是错误的，但刘新娥家人来我家闭门，性质更严重，答应在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之间再行协调。”之后，与以往每次努力之后一样，又是不了了之。

“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

缪建平无罪释放后，很少去上班，除了为国家赔偿之事奔波，多在家里休养。他说，检察官问他时，多次警告他，“不按我们要求承认，就送你进看守所，让你和你审判过的犯人关在一起”，10个月牢狱之灾让他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不好，有时想起往事，眼前发黑，似要晕倒。

今年起，江柯虽仍去法院，但不再办案，因为“阴影时刻缠绕”着他，他无法保证冷静断

案，“作为一名法官，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为此，在一次单位大会上，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不务正业。”

两名法官对国家赔偿看得很重，“作为法官，应该得到这基本的公道。”另外让他们委屈的是，在有些人眼里，他们无罪释放，只是因为得到了法院“自己人”的照顾，而检察院一直对此不服，只有对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实施国家赔偿，他们才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清白。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是县法院排名第一的科级后备干部人选，江柯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6年过去，县城郊区已另造新城，县法院变身成一栋超豪华大楼，身边的同事包括当年主办检察官接连升职，2005年县检察院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而缪建平和江柯还在“原地踏步”，“我的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缪说。

6年过去，熟悉此案的有关领导也纷纷升迁或调离，两名法官发现，领导们原来所谓“解决”的承诺，实际上就一个字——“拖”。

县法院上一任院长临走前，分别对两名法官表示歉意，江柯说，送走院长后，他绕着法院大楼走了半圈，无声流泪，“我听出他的无奈，想帮助我却有说不出的阻力。”

最近，新任院长对他们的表态是，会督促中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但结果如何不是他能掌控的。

与4年前一样，余干县检察院和上饶市中院再次婉拒本报记者采访，后者的理由依然是——“需要省高院颁发政法记者采访证。”

国家赔偿久拖不决，缪建平渐渐变得脾气暴躁，容易激动，有时记忆会出现短路，一名朋友说：“他说话现在很啰嗦，很明白的话要颠三倒四地讲好几次，生怕别人听不懂。”

江柯也承认：“我压力太大了，可以说，我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时想到国家赔偿毫无进展，就会有发疯的感觉。还好，我的家人给了我最大安慰。”

县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大家对他们俩原来很同情，但他们好像总是责怪法院没有尽力解决，有些人就生厌了。坐在咖啡馆里，江柯谈起国家赔偿来心态复杂，有时振臂高声说：“相信法律，相信组织，”一会儿又语气凄凉，“感觉人往下坡路走，越走越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最后他说，实在不行就进京上访，“原来我们一直很克制，就怕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形象。”

在中国，像缪建平、江柯这样为争取国家赔偿而不得的人屡见不鲜。中国行政法学院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缪建平说，余干县检察院迟迟不愿实施国家赔偿，就是担心赔偿之后，当初案件主办检察官将遭受错案责任追究，甚至有清除出检察队伍的可能。

6年过去，江柯自杀留在胸口的伤疤，像一条毒蛇盘踞在那无法抹去，阴雨天里这里会隐隐作痛，江柯说，更痛的是心里。据新华社